

删人快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硕
《翦商》

历史，以人的维度

□蒯乐昊

听到青年历史学者李硕重病生命垂危的消息，我愕然，其时我正津津有味捧读他的新作《翦商》，一心想着，等看完书，我就要去四川找这个人，跟他聊天，约他采访，听他说故事，并成为朋友。没想到劈面就看见朋友圈他在病榻的照片，虽有病容，但头发很黑，发量很多，他才46岁啊，怎么说都是才能天妒。

在他与朋友们告别的讯息里，他提到，“如果能多活一两周，我会把部分文章收拢一下，弄个自选集。这东西唯一的特点就是跨度太大，有些单篇文章后面是写成一本书的想法。所以我活几辈子也忙不完，赶紧死了算了。”

这个我信。读他的书，能够明显感受到做学问的人从一个点如贴地草芽延伸开去，最后扩到漫山遍野的地步，背后是对知识永无穷尽的好奇心。

这部旨在写“殷商之变与华夏新生”的学术著作，可以被视为去年考古界最值得骄傲的一本出版物。“这本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我要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二里头考古队长、考古学家许宏这样隆重推荐。虽然写作焦点是殷周革命，但李硕的写法却相当壮阔，他从这一历史事件的前一千多年写起，从新石器时代的尾声切入。他本是侧重研究中古史以及战争史的专家，对于周灭商，他的着力点是商代的“人祭”，杀人如麻的残忍“人祭”，从不带感情色彩的考古发掘报告，被李硕还原成了有画面、有声音的历史现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么写过。

从漠视生命到重视生命，“人祭”制度的被废止才是华夏新生的核心价值。《翦商》通过研究发现，人祭制度的消亡，跟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虽然保留这些史料可能有助于书写前朝的暴虐无道，但周公可能是为了防止死灰复燃。这一清除政策执行得很成功，因此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甚至连制作陶俑随葬的风气都要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能也是担心，陶俑的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和殉葬时代的记忆。

周朝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但是逐渐采用了一种世俗而温情的人文主义立场，并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这几乎奠定了后世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的基础。周文化和商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族群性格也迥异，商人直率冲动，思维活跃，有强者的自信浑不吝；周人则含蓄隐忍，警觉于外部世界，总是谨小慎微，担心出现危机——作为西陲小邦，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1976年，周文王居住的宅院在岐山脚下的周原被完整地发掘了出来，在这个类似四合院结构的院落厢房，挖出了两座窖穴，里面满坑满谷，藏的都是散碎的龟甲，共有一万七千多片，这就是周文王生前的“秘密工作室”。周昌忍受商朝盘剥，在此密习商王的神通占卜之术，进而萌生了翦商造反的念头。影响后世至深的《周易》，最初也不过是周文王事无巨细都要起上一卦的练习册而已。按《易经》中阴阳相生，“颠倒成对”的原则，世间一切既有的事实都能用相反的方式再现一遍。曾经弱小的商族后来建立了强大的商朝，但这个过程也可以逆向而生，即：强大的商朝也终将灭亡。

李硕意识到，在周灭商之后，周人性格中的这些要素：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逐渐沉淀下来，成为新华夏绵延千年的样板品格。他写道，“在姜里的地牢里，周昌的身体虽无法逃离，但他推演的六十四卦组对原则却自行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这大概就是历史赋予人的大开大阖，在宏大的时空维度面前，人可以洞悉生命无常，忘却小我之短暂速朽，同时依然保持对一个更高远之物的信仰。这也是李硕在生死考验之下所流露出来的豁达，“老友们聊起我时，应该都是开心的吧。李硕这破人，不长的一辈子，趣事还不算太少，心就好，不必伤悼。”

那些未完成的写作，他也一律看淡了。“目前应该算是最好的结局，不需要开大刀受大罪，一切医学手段都已经失去作用。我最满意。大块劳生，息我以死，我活着也很少能享受生活，总忙忙乱乱操心下面写个什么，现在，总算能休息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海明威著 陈良廷等译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

在西高峰的近旁

□育邦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家形象是由多种混合因素构成的，他是一个写出《乞力马扎罗的雪》《大双心河》《杀手》等一批精美绝伦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是那个写了《太阳照常升起》长篇杰作的作家，还是牛气冲天的老人圣地亚哥（《老人与海》）的缔造者，“冰山理论”的践行者……更令人瞩目的是，围绕着写作，他的生活可谓活色生香、如火如荼，钓鱼、打猎、斗牛、拳击是他的运动，雪茄、美酒、海滩、美女也是他日常的标配，他多次上战场，光荣负伤，亲历两次世界大战，他经历过许多人只能在梦中遭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使他的声誉如日中天，他享受着世俗生活的“喧哗与骚动”。作为作家，在大众眼中，他享有超级明星的殊荣。

同时代人威廉·福克纳清晰地看到海明威的表演性，也对他的作品有一针见血的评述。他赞美《老人与海》：“时间会显示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指的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所能写出的最优秀的单篇作品。”又指出：“他发现了上帝，发现了一个造物主……”同时，福克纳敏锐地洞悉到海明威写作中的巨大弱点：“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我塑造造成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也都掌握在每一个对手的手里，仅仅为了向自己、向对手证明他们能做到何等的坚强。”这使奉行斗争哲学的海明威气急败坏，从此就大骂福克纳是一个“南方的乡下佬、婊子样的坏种”。1961年7月2日，在爱达荷州凯彻姆家中，海明威举起双管猎枪，饮弹自尽。第二天，远在密西西比的福克纳就说：“海明威抗议得太多，他表现出的无畏与男子汉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伪装。”福克纳虽不厚道，但其目光如炬。

诗人更容易看清楚小说家的面目。由于语言简洁凝练、有意与无意的留白，“冰山”沉默移动式的表达方式等风格化耀眼的写作实践，海明威赢得了众多诗人的青睐，华莱士·史蒂文斯以为海明威是“最重要的在世诗人，就非凡的现实这样题材而言”，即便前者被后者狠狠地暴打一顿。

但是，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考量，从小说本质的内部来考察海明威的话，我以为他最恰当的定位是短篇小说写作领域里“卓越的匠人”。《乞力马扎罗的雪》《白象似的群山》《大双心河》《杀手》《一天的等待》《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在异乡》《山梁下》《世界之都》《世上的光》《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而幸福的生活》《雨中的猫》《印第安人营地》等这样一批短篇小说就足以奠定他20世纪世界一流小说家的地位。哈德罗·布鲁姆断言，从某些方面看，海明威的永久正典地位似乎毋庸置疑，美国现代小说必定永久流传下去的作品将包括海明威两打以上的短篇小说。我提及的这些小说则是这些将“永久流传下去的作品”中的精品——它们是代表海明威作为“卓越的匠人”而存在的小说艺术品。在海明威那里，这些小说就像尼克钓到的一条条好鲑鱼。海明威是一个擅于在森林中发现猎物的猎手，他嗅觉灵敏并有耐心寻找适合他的题材，弗兰克·奥康纳批评他搞的都是“小艺术”。纵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的写作题材，我们也不难想象福克纳的批评态度。这是艺术上的大小之辨，也隐含着高下之别。

《乞力马扎罗的雪》初稿中，青年作家哈里这样想：“关于他小时候待过的地区，他写得相当不错。是他当时能达到的最佳水平。”没错，“哈里”就是海明威。那个地方是海明威小时候度假的密歇根州，回忆中自称为“尼克·亚当斯”。海明威曾经出版过一本《尼克·亚当斯故事集》，几乎囊括海明威早期大部分精湛的短篇。哈里要死了，但是他希望到白雪皑皑的雪山之巅实现他的愿望，小说开头就说：“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豹子到这样高的地方去寻找什么，没有人作出解释。”作为作家，哈里要攀登顶峰，而顶峰就意味着成为雪山上的豹子，必然面临死亡的境地。这也海明威一生写作境遇的隐喻。《在异乡》中，那个少校——最杰出的击剑手——的手被战争毁了，同时他必须忍受失去爱人的巨大悲伤。时代摧毁了少校的双手，也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作者海明威的手能否紧紧握住那只笔呢？他做到了，他也是“最杰出的击剑手”，他击中了人性中最为幽暗的部分。

强烈的海明威风格给后来的小说家都上了一课，就是个人风格将左右讲故事的方式，将掌控文本的整体性图景。在某种意义上，海明威塑造了20世纪短篇小说的一种叙事方式。

那些柔软而博大的时刻，海明威享有悲悯的光芒。

隐匿之光



四川文艺出版社
[韩]韩江著 崔有学译
《植物妻子》

厌食书写的极致

□张怡微

韩国女作家韩江曾于2016年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击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几周前逝世的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水死》、及“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终曲《失踪的孩子》。2018年她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并且在同年凭借书写光州事件题材的《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其世界影响力可见一斑。实际上早在2016年之前，韩江就已经拿遍了韩国重要的文学奖项。《植物妻子》曾于2014年引进中国，今年于四川文艺出版社重版，已是作家抱得大名时。

《植物妻子》收入了韩江1996年到2000年之间写作的八部中短篇小说。“植物妻子”顾名思义，写作的是在婚姻中逐渐“成为植物”的女性形象。女性与植物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对黯淡的婚姻生活自谋生路的虚拟路径，竭力汲取世俗生活供应不足的阳光和营养。小说中的“妻”，身上的瘀青引发了丈夫复杂的凝视。一方面丈夫也怜悯妻子并不算太好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他因为激情退去、放大着妻子肉体的缺点。小说以男性第一人称的视角写道：“我无法唤回肉体欲望。看到臀部、肋下、小腿和白大腿的内侧皮肤上都泛着青色，我突然火冒三丈，等火消退下来后又感到莫名的悲哀……看着妻子的样子，我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失望、怜悯和悲凉的滋味”。妻子的瘀青越长越大，行为也越发古怪，平日常十分虚弱病态，但“只要看到阳光，就想脱掉衣服”。男主人公对此束手无策。但作家为“妻子”倾注的意象已越来越丰满，“在七十万人口聚集的地方生活总觉得会渐渐枯死”，这是发自“妻子”内心对于世俗生活的判断。

在《植物妻子》这本小说集中，许多女性都有类似厌食症的呕吐症状，她们不知是对肉食产生了病理性的厌恶，还是对世俗生活本身极度失望。有秩序的生活，就像疾病基因一样侵蚀着女性身体。女主人公原来想要云游世界，却最终将手上不多的资金投入到结婚上，她听起来不是很“现实”的梦想，就这样被“现实”抽干、吃掉了。她的魂魄也日益被摧毁，在丈夫的凝视中，她“像白菜叶子般耷拉着细窄的肩膀……好像有看不见的锁链和沉重的铁球拘束着妻子的腿脚……”她就这样被冻结在那里。”很难说这是极度写实的女性处境，还是现代主义超现实的笔法，总之，韩江以一种极其直白、完全不制造阅读障碍的方式，告诉读者，“妻子”受不了了，为了求生，她不得不成为一棵植物。她再当“妻子”的话，会浑身发黑地死去。她要自救。小说最后写到男主人公回到阳台把水浇到妻子胸前，“她的身体像巨大的植物的叶子一样晃动活着了过来……妻子从来没有像这样美丽动人过。”这是她个体的革命。

我对韩江的兴趣，来自于“厌食”书写。我暂时没有看到一个当代作家如此执着、重复地将女性饮食和自我身份建构结合在一起，且获得了世界级的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中，有许多表现饥饿的名著，大多表现为物质匮乏的生存危机，或者被压抑的人欲终将唤起的象征意义。但是“厌食症”是疾病书写脉络中非常少见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本身对这个病就不算了解，我们只在西方小说和电影中，看到过因为减肥过度而患上厌食症的女性。我们曾有一个学生，在散文课上写到过这个病。她提及从得病到痊愈，父母都不曾真正理解过这个病，就连她自己，似乎对书写厌食症都感到困惑。这让我想到疾病书写的发展，从肺结核、梅毒一直到阿尔兹海默症，它不断释放着现代医疗在文学艺术阐释中的可能性。上海作家王周生、薛舒，于是都曾写过阿尔兹海默症，最近于是在新作《有且仅有》中又开始关注到自闭症。文学的力量正在于此，作家不是医生，治不了病，但作家经由书写，会提醒我们去问一问，这样的痛苦到底因何而起，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身边的人又能做什么。韩江的“素食实践”及其不厌其烦地书写女儿或母亲的呕吐体验，似乎都在暗示着读者，女性身体作为文化展示的一种媒介，正释放着我们不够了解的生命能量。这是十分精到的文学设计，将女性对于自身境遇的生理及心理反应剥离开来，就好像《植物妻子》中的妻子，她的社会规训期待她以好听的声音、姣好的外貌和讨人喜欢的方式投入婚姻，但是她的身体始终在抵抗。这似乎隐喻着韩国女性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无力做符合逻辑的反抗，只能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反应完成被压抑的欲望。而在丈夫的眼里，她们在失去了“妻子”这一职能之后，就变成了妖怪。使用男性第一人称的意图，在此显露出黑色幽默的意味来。

微言达义